



——
弘扬海州优秀传统文化专辑

海州文史资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员会

第三期

主编：胡正德 编委：徐恆渭 龚昌世 孙大伟 施 颀 庞云翹 许赞有 黄秀英 责任编辑：孙海平



海州文史资料

——弘扬海州优秀传统文化专辑

(第 三 期)

政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员会 编印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序 言

政协海州区委员会主席 胡正德



海州，为连云港市的摇篮，向以“淮口巨镇”和“东海名郡”著称。自秦置朐县以来，海州隶属多变，几经易名；沧海桑田，

几多兴衰；但这方水土上的优秀文化却世代绵延。从石器时代的遗址，先民东渡的旧迹，秦之东门的立石，海上丝绸路的门户，齐鲁分野的界碑，史前图腾的文化，无不展示着先辈们创造的文化奇葩。这个地方，人称海州人，语言叫海州话，山曰海州山，海叫海州湾。古老的文化渊源和其特殊的地域位置，形成了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海州文化。千百年以来，这里古风蕴籍，文气沛然，孕育了众多文化名家，引来了无数骚人墨客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，成为海州人民，乃至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。

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这不是一般意义的要求，而是时代赋予的使命，传统文化“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。”我们目前正处社会大变革时代，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如不及时挖掘、整理、研究、弘扬，现代意识将会冲刷掉历史的陈迹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亦将出现断层现象。

政协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员会、连云港市历史学会、连云港市古建筑园林工程公司联合举办的“弘扬海州优秀传统文化研讨会”，得到了连云港市著名学者专家的热情支持，得到了仲其臻、杨东野、李洪甫、刘凤桂等同志的真情相助。与会者怀着浓烈的桑梓之情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再现了古城海州深厚的文化渊源、历史沿革和旧貌新颜；再创更加辉煌的新海州的情怀，亦贯穿于篇章之中，流动于字里行间。这次专题研讨会议在我市尚属首次，对于传承海州优秀传统文化，宣传海州，建设海州，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地方的文化，是激发人们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、建设家乡的重要精神力量。谁都相信，富有创造力的海州人民，一定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，把家乡建设得更富强、更繁荣、更美好！

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“弘扬海州优秀传统文化研讨会”场景

目 录

序 言.....	胡正德
略论古海州宗教文化艺术的基本特点.....	杨东野(1)
从古海州志辨新浦之初四疑.....	韩世泳(4)
海州方志编修考略.....	张卫怀 曹寿田(9)
关于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主要编纂者的刍议.....	许厚文(14)
浅谈《镜花缘》.....	吴中成(19)
海州书法史迹述略.....	陈凤桐 朱炳旭(24)
清代戏曲与海州.....	朱秋华(30)
论海州刘氏家族与崇祯皇帝的关系及相关问题.....	朱炳旭(34)
《东海黄公》考源.....	王志坚(40)
《图经本草》中的海州药物考释.....	吴 舟(43)
海州建置区划沿革简述.....	孙海平(45)
秦东门寻觅.....	刘凤桂(48)
“胸山、胸县”初探.....	张义壮(52)
海州“胸”字地名何其多.....	陈 中(54)
秦东门与徐福东渡入海处.....	李克文(55)
徐福楼船此际开	
——邑人吴之椿的咏徐福诗浅议.....	汪维懋(58)
北云台山佛教、道教的发展与建筑.....	张树庄(59)
中华气功文化探源	
——古海州的道教和气功.....	滕 英(62)
海州的大慈禅寺.....	曹 栩(66)
认识海州.....	张传藻(67)
孔望山和花果山.....	(北京)于光远(69)
试论海州“花文化”.....	梁乐声(71)
古海州的书院.....	郁正佑(73)
古海州的学宫.....	郁正佑(75)
海州中学建校起始考.....	谢长厚(77)
江北名流沈云沛.....	张传藻(80)
海属报界名人陈新明.....	张学仁(82)
充实文化内涵 完美海州古城.....	彭 云(84)
海州的近代建筑及其价值.....	张祖桂(87)
仿古建筑管见	
——兼谈海州仿古建筑中的不足.....	骆玉宽(90)
浅谈海州胸园的美学构思.....	杨同本 张佑元(93)
弘扬传统文化 促进经济建设	
——关于海州传统文化转化市场经济建设的构思.....	刘洪石(95)
关于发展海州古城文化的构思.....	滕步华 仲跻敏(97)
淮海东来第一城——海州.....	张峦耀 魏锋之 徐 腾(100)
建设古城 弘扬海州.....	海州区城乡建设委员会(102)

略论古海州宗教文化艺术的基本特点

杨东野

西域佛教及其文化艺术,通过丝绸之路,传到中原,延至徐海,形成一种宗教派系,而与中国传统的道教共存相依,逐步地发展推广开来。在海州,宗教文化艺术占有重要地位,具有很大影响,曾出现过灿烂多彩的景象。

一、早期性与古朴性

公元1世纪中叶,佛教传入中国之初,封地在徐州的楚王英即“诵黄老之微言,尚浮屠之仁祠”,既信道教,又做佛事。地属徐州之域的海州遂传来了佛教,开始建祭祀之寺宇。据《金石录》载:“永寿元年(公元155年)春正月,有汉东海相桓君,修饰祠宇事”;“熹平元年(公元172年)夏四月,东海相山阳满君,修饰祠宇事”。这可说是海州建宗教祠宇的早期之记载。在佛教传入之初即建佛塔,早于佛像之传入。海州最早建立的是“鹫峰石塔”。据《云台山志》卷二[寺观:法起寺]条中云:“[李偏德法起寺碑文]:有寺曰‘法起’,相传鹫峰石塔建自汉时……”说是汉时康居国僧人游方到宿城建立此石塔,西域僧侣曾园寂于此。

孔望山汉代摩崖造象群镌刻出现于东汉桓灵之际,早于大同云岗和洛阳龙门的北魏石窟造象,亦早于敦煌佛教艺术,乃是九州石佛摩崖第1尊。在孔望山龙洞以西茂密的丛林中有1尊硕大的园雕石象亦是汉代的作品。从这尊石像整体雕刻技艺上看,石像的腿间、腹下、尾部均没有镂空,这在汉代石兽的雕刻中是常见的,代表了汉代立体石刻的典型风格;而阴刻线条的技艺也是汉代画像石刻的基本特点。这些都表现出海州佛教石刻的早期性。

这种早期性体现在古朴性上,以孔望山摩崖造象来看,其雕刻技法明显地与汉画像石是一致的,大体有凸面线刻、剔地浅浮雕、高浮雕、单线阴刻4种。如X68、X66和X21及其周围的人物,酷似东汉桓帝时期沂南画像石的作品,是用凸面线刻法;又如X1、X2、X82用的是剔地浅浮雕,酷似徐州茅村墓的汉画像石;再如X21涅槃、X83和X82舍身饲虎图中的虎头,都是用高浮雕的技法。以上是利用了峭壁起伏的自然形势、借突起的山石修凿而成,这些与山东安邱董家庄汉画像石墓中的雕刻颇为相似。孔望山摩崖造像上的4座小龛,是用单线阴刻,似画像石、画像砖,与山东临淄发现的东汉石刻颇为相似。这些都表现了海州雕刻技法的古朴性。

二、交融性

佛教初传中国,作为一种神仙方术,即与本土的道教相结合,形成相得益彰之势。佛教与道教互相交融、合流,是中国早期宗教造像的一个基本特点。这在古海州宗教造像艺术上是有明显表现的。孔望山摩崖造像,有18组105躯,所表现的是佛、道教与世俗的题材,是以道教为尊、佛教为主的形象,是把佛、道教交揉在一起的。在同一坡面上,佛教题材有X21涅槃像、X82、X83舍身饲虎像等;道教题材有X68、X66、X1像和2、3、4号龛内画像,都是太平道教的造像。在X68、X66和X21下方山石上所凿的园形香炉或灯碗,X66像下方刻出的莲座,在4个小龛内的阴线画像,以及衣冠服饰,都表现出佛、道交揉。

在这些摩崖造像的群体中,以西王母、老子像居中居上,显示其至尊的地位。其中X1与X66是

门亭长与弘扬佛事的施主,都居于突出位置。这些造像都侧身向着涅槃像,其他戴锐顶帽的俗装像几乎多朝向举右手作说法状的立佛或坐佛。立佛和坐佛都散布在涅槃像之上侧,作“施无畏相”,这些都表示佛临涅槃前为众弟子等说法的情景。这里有哀悼的群像围绕在涅槃像上下,也有跪着面朝佛像在倾听佛说法,还有执花、双手托盘盒向佛作最后的供养,这些都是围绕着“涅槃变”为主题展开的。此处镌刻佛、道交揉跃然石上。

在孔望山摩崖造像下面原有一座大庙,乃是东海庙,在山脚留下的石碣形碑座是东汉熹平元年(公元172年)《东海庙碑》之座,正是道教见证之物。遗址X1、X68、X66等都是道教造像。汤用彤先生说过“东汉佛教是依附于道教而存在的”。东汉时楚王英“晚节更喜黄老,学为浮屠,斋戒祭祀”,他是道、佛教并奉的,佛、道教在艺术造像上的并列与交揉是顺理成章的。花果山上三元宫也是佛、道教结合、交揉的一个典型所在。此处36座寺院群体建筑中,多数是佛教的庙宇,还有道教的寺观,如玉皇阁、吕祖庵、真武殿、老君堂等,在这些寺院中都是佛、道教偶像并塑的,足见三元宫的群体寺观是佛、道交揉的。

三、普遍性

佛教自东汉末传入徐海地区,佛教寺宇建筑与佛教文化艺术亦经历朝历代在古海州一带逐步传播,可以说遍及各地,具有普遍性。据记载,东汉时在宿城山中有法起寺的建筑,并有鸞峰石塔;北齐武平六年(公元575年)在中云诸曹村溪云山后建云门寺。唐朝诗人描写唐时佛寺的盛况是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这时期海州一带佛教寺宇遍及各地,唐开元六年在隔村隔峰建崇善寺;唐开元十一年在海州城建大云寺,时为当地最大的寺院,海州刺史李邕特撰《大云寺禅院碑》,新罗通禅师曾在此住持;贞观七年(公元633年)建立众香寺,后改为中兴寺,再改为龙兴寺;元和二十年在海州东北巨平山东山(即新县)建立兴国寺;在大村有心净寺;在孔望山有海龙王庙,后改为龙洞庵。宋代天圣元年(公元1023年)在大村建海清寺并阿育王塔;嘉佑三年(公元1058年)在海州治西街建大悲寺;景定元年在大伊山前建佛陀寺;皇佑二年(公元1050年)在大伊山后建古佛寺。在南云台山即花果山中有三元圣宫,初建于唐,重建于宋、敕于明。兴盛时,由36处建筑组成一个建筑群,是一群佛道教大融合的场地。明朝时对法起寺、云门寺等作了重修。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年),有石佛寺、安和寺、国清寺、圣福法宁寺、嘉佑院等归并于此。清康熙四十九年(公元1710年)在鹰游山建镇海寺;乾隆二十七年(公元1762年)重建殿堂廊庑,计百余间,徒众日甚。据《云台山志》卷二[寺观]条中所记:海州云台山区自汉至清所逢寺宇有:法起寺、云门寺、三元圣宫、石佛庵、大佛殿、观音堂、观音庵、地藏庵、华严庵、海清寺、船石庵、禅兴寺、兴国寺、安和寺、海宁寺、悟道庵、雪道庵、悟正庵、蓑衣庵、吉祥寺、崇善寺、长春庵、白云寺、大佛寺、碧泉庵、丹霞寺、镇海寺等四五十座。据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载:自汉至清,海州包括赣榆、沐阳共有寺庙104处,并有祠宇、祭坛54处,合计有158处,真可谓庙宇遍及海州各地。

这些寺院许多是藏经、诵经、大做佛事之所在。据《云台山志》卷三[艺文敕谕]条文中记有明神宗所撰《颁赐藏经敕谕》,赏海宁寺经书41函并旧刻藏经637函,并嘱僧人悉心诵读、珍藏。三元宫设有藏经阁,藏经甚多。该寺盛时每日香火不断,多达20000余家,住寺僧数百人。每年正月十五前后远近数省信男虔女络绎不绝,鞭炮烟火通宵不绝。海清寺千百年来香火不断,阿育王塔内东壁上盛延德等人刻石记云:“天圣二年正月,内设供僧八百五十人;天圣三年,设供僧九百人;天圣五年,设供僧一百人;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人。”明清时法起寺前后有大殿、中殿、天王殿、净土阁、弥勒殿、藏经楼、法堂、方丈、祖堂、仓库及群房200余间,盛时僧侣360多人,香火不衰,江淮来朝者络绎不绝。

从历代寺院建筑及藏经、佛事活动观之,可见古海州佛教文化之普遍性。

四、渗透性

佛教传播一般是先传佛教故事和偶像,然后才是译经活动。随着译经活动的发展,人们对佛教内容的了解不断加深,就推动着造像活动的发展。佛教造像于公元前后出现,随着便迅速发展起来,形成了绚烂多彩、奇异引人的佛教艺术形象。佛教由于大量运用具体形象,树立偶像进行传播而在历史上被称为“象教”。自西域传到内地以后,从汉代至明清,佛、菩萨的形象既作为被膜拜的偶像,又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而一变再变,后愈来愈变成人间的世俗形象。尽管在形象上有所变化,而题材与内容仍以小乘教为主,基本上塑造与表现的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创教的形象,多数绘制、雕塑、镌刻的是释迦牟尼及弥勒佛的说法图,属于佛教起源的本生(本缘)故事,释迦的涅槃图,以及小乘教经典所演绎出来的佛教故事等,有众多的菩萨、沙陀的形象。在东汉桓帝时,大月氏人支谶、支曜等从西域前来传布佛教,也把贵霜王朝时期所创造的犍陀罗艺术带了进来,随着佛教造像之风从西域到内地逐渐趋向兴盛。佛教造像表现形式主要是石窟壁画、石窟塑像(千佛洞)、摩崖造像、木雕、石刻塑像等。东汉末时的孔望山摩崖造像的佛教题材,就是依据安世高所译《小泥洹经》(即涅槃)、支谶所译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般舟三昧经》中所述的涅槃变、舍身饲虎的内容与形象而塑造的。造像中的X2、X61和X76佛像的手印姿态,都是把右手抬到胸前,掌心向外,左手置于胸前持一袋状物,都同东汉的译经相合。在造像上有头戴尖顶垂翅帽和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,都是佛教初传来的反映。佛像全身有凹入形之身光,在《观佛三昧海经》(观像品)中有记述。佛教造像中的X2、X21、X61、X71和X76等像,有“项光”,有“肉髻”,有以手势作“印相”,有以双足交叠作“结跏趺坐”,衣服多为“通肩大衣”,这些佛教形式都是按照西域佛教经典所塑造的。

孔望山脚下之石雕大象,足踏莲花,正与叶波国太子须大努以象施人、乞行莲花上同;象旁雕出1人,又与故事中欢喜受象之梵志相同。此象旁之人,系《经律异相》中之梵志。这驱象者乃象奴也。这些基本上吸取了犍陀罗造像所表现的形式,结合本地传统技艺的手法而形成的。初建于唐、重建于宋、敕赐于明的三元宫中庞大的佛像、道教建筑群,所塑造的众多的佛、道教偶像,正是犍陀罗艺术的渗透与我国传统技艺交揉的产物。

西汉末年,西域僧人越流沙跋涉来到中国内地传教,开始把阿育王建塔的故事传来,康居国僧人游方到宿城建起石塔。北宋天圣元年(公元1023年),在大村、花果山下按照印度迦利色迦王时代所建之佛教寺塔建造的阿育王塔(亦称海清寺塔),是一座典型的宏大的佛塔。它高40余米,为仿阁楼式,9级8面,砖石结构;2至9层是平座,涩式腰檐;8层以下,外壁内绕以走廊,塔中心砌八角形中心柱。整个建筑结构典雅、朴实,风格雄浑凝重。《海清寺塔柳峦记碣》中写道:“上观,似从天降,回彻清霄;下看,似从地涌成,宝堂连海”。塔底存放着石函、铁匣、银棺、鎏金银棺、银方匣、银金舍多件,塔内安置着“舍利”、“佛骨”、“佛牙”等,并细腻地镌刻着《涅槃变图》。这座古塔就是深受西域造塔的影响而建立的。古海州地区对佛教经典与技艺的吸取而形成自己的样式与风格,这便是渗透性。

(作者系连云港市历史学会副会长·副编审)

从古海州志辨新浦之初四疑

韩世泳

新浦——连云港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信息中心，这个崛起于古海州版图上的新兴城市，历史很短，至今不足 200 年。按理说，象这样年轻的城市，历史应该是很清楚的。而事实并非如此。由于它“问世”之后，特别是它的最初形成发育阶段，正遇上了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，无人为其写史、修志。因此，关于新浦初期的一些基本情况，无论是报刊文章，还是民间传说，都是各有一说，给人们带来了一些疑题。近几年，我在参与编修新浦区志过程中，为了搞清这些问题，查阅了一些资料，从几部古海州志，特别是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中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。下面我把从古海州志中所受到的启示和由此形成的几点粗浅看法，归纳为四个方面，就教于各位专家。

一、“新浦”原意辨

如今“新浦”是地名，已毫无异议。一提新浦，大家就知道是指连云港市的中心市区。但是，对“新浦”一词的原意是什么，解释并不一致：一说是“新的水滨”；一说是一条小河；一说是“河流入海口”；一说是地名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解释呢？我认为，这里边有一个对古海州地区所谓“浦”的特定含义的理解问题。因此，要弄清“新浦”一词原意，必须先搞清古海属地区“浦”的原意。

从各种辞书上看，“浦”字除作姓氏用之外，还有“濒也”、“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方”、“水源枝注江海边曰浦”、“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”等几种解释。古海属地区之“浦”指的是哪一种？对照一下古海州几部志书关于“浦”的载述，我认为，古海属地区的“浦”，就是指那些把“大水”引向“小口”而“别通”的小水渠。

《辞海》说，所谓“大水”是指“平原出水，言水不入土，而出于地，非涌泉出也。”在平原上“非涌泉出”“出于地而又不入土”的水，就是天上降下的雨水所形成的遍地流淌的洪水。“浦”不就是指那些将洪水汇集起来，通过一些“小口”通入大江、大海的一条条小河道嘛！这是从字义上理解的。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古海州志中记述的“东海诸浦”的特征，问题就更清楚了。

第一，《隆庆海州志》、《康熙海州志》、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都把“浦”列于山川卷“海州诸水”中加以载述。特别是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把大村温水河也放在“浦”一起记述，并在“温水河”条下特意加上“此河为小水，故次于东海诸浦之间”的按语。

第二，从古海州志对“东海诸浦”的注释看，古海州地区的所谓“浦”有四个特征：一是“上无源头”。二是“下通海潮”。三是“便渔舟盐舶”。四是相当一部分经过了人工疏浚加工。如嘉庆海州志载：“社林浦，长十五里，阔三丈，深五尺”；“栖云浦，长五里，阔三丈，深七尺”；“台浦，长五里，阔三丈。岸有石墩如台”等。

从以上两方面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，古海州之“浦”，实际上就是指沿海滩地上那些无正式源泉的、季节性向海里排泄洪水的各自独立的小水系。而后经盐工、渔民加工，成了运盐河道和渔船停泊避风之处。

古海州沿海滩地上为什么会有这些独立的小水系呢？这是海州海岸不断变迁的结果。据海州志记载，古代海州城离海边很近。可到了“明万历六年(1578年)至清咸丰五年(1855年)这277年间，由于黄河全部走苏北入海，泥沙骤增”(《连云港港志》)，使苏北海岸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大量泥沙的淤垫，使海岸迅速向海州古城东北方向迁徙。原来在大海中的云台山，在这期间逐渐离海归陆。在其周边现出了大片大片的海滩。夏秋大雨季节，洪水漫流，顺势汇集由低洼地带入海。久而久之，这些汇集洪水入海的低洼地带，由于不断受洪水的洗刷和海潮冲刷，越来越深、越来越宽，自然形成了一条条“上无源头”、“下通海潮”的小水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海滩变成了新盐滩，成了人们晒盐、捕鱼的场所，这一条条小水系又得到了疏浚加工。便成了具有上述明显特征的“东海诸浦”。

海岸的不断迁徙，使这些通称“浦”的小水系的下游不断延伸，使其保持“下通海潮”的功能。“新浦”就是在这种过程中产生的。古城海州东南方的海岸，原在现板浦以南。由于大海北徙，出现了“板浦”。后经修浚使板浦河和运盐河正式沟通成为“场河”，至“板浦口”(即现板浦镇一带)入海。后“板浦口”以下淤塞为海滩，出现了“卞家浦”，经人工挑疏，运盐河又经板浦、卞家浦从卞河口入海。当卞河口以北又淤成滩地时，从卞河口至孔望山东北处的大海边，又形成了一条小水系，因出现于板浦、卞家浦之后，时人称之为“新浦”(因此河流经朐山脚下，当地人又叫朐山河)。“新浦口”为其入海口。经盐商捐资疏浚，新浦河又成了整个运盐河下游的新河段。“新浦口”理所当然地成了运盐河的入海口。这就是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所载海州“甲子河记”所说的“中河……北汇板浦为场河，又自板浦历卞家浦，过孔望山，出州北为新浦，皆鹺运所经”的“新浦”。由此可见，“新浦”与东海诸浦一样，原是在古海州海岸变迁过程中形成的“上无源头，下通海潮，便渔舟盐舶”的小河流的名称。其入海口——“新浦口”才是当初的地点名称。现在新浦这个地名，应是由“新浦口”简化而来的，而不是“新浦”河名的沿用。

二、新浦初位辨

新浦这个地方，是不是一开始就在现在新浦市区这一带？还是在什么别的地方？在一些材料中，说法也不一。有的说，当初“新浦”在“卞家浦北，州城以东的地方”；有的说，在“现在东海富安至大浦闸一段河口。”哪种说法确切呢？我认为，前种说法比较确切。可以更具体地说，作为地方名称的“新浦口”，起初就在孔望山东北部，现玉带河与西盐河交汇处的工农桥和玉带河闸附近。因为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收录的海州甲子河记，为我们提供了具体依据：

第一，“甲子河记”说“新浦口”是新浦河的入海口，也是甲子河与运盐河(现西盐河)的接头处。这和玉带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，玉带河借用了甲子河下游河道。按古州志记载，海州玉带河原在海州城内“自城东马家汪至西水关。”后州牧孙明忠曾改蔷薇河为玉带河。现在的玉带河是近代开挖的，分东西两段。我们这里所说的是1956年重新开挖的从新海电厂附近至西盐河的西玉带河，它是沟通蔷薇河和运盐河的重要河道。它的走向是从新海电厂北向东，经海州城东北角的城河口、网疃庄、小赵庄至孔望山西麓折向北，在孔望山东北处与西盐河接通，交接处建有工农桥。而在这段河道中，从海州东门外的小赵庄东北，至与西盐河交汇处这一段，正是借用了原海州甲子河的一段河道。甲子河是出城东门，沿护城河向北，在城河口附近折向东，经后网疃庄、小赵庄一带到“新浦口”。现在海州东门外城河口向东的后网疃、小赵庄一带，仍可见当年甲子河故迹。因此，现孔望山东北处玉带河和西盐河交汇口一带，应是当年“新浦口”的所在地。

第二，“甲子河记”说，“孔望山至州城七八里，崖岸荦确，舟楫不通”。又说，新开挖的甲子河“东自新浦口，西达城东门，……计长一千一丈六尺有奇”，约合3.3公里。这和玉带河闸至海州东门的距离基本相当。

第三,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在记述海州甲子河时写道,“嘉庆九年五月,阖州士民率钱开渠,自东门而北,径城河而东,至孔望山东,接胸山河,达于板浦”。甲子河开挖年代,正是知州唐仲冕主修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之时。“甲子河记”是唐知州利用在率众开挖甲子河过程中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亲自撰写、当即入志的。资料是真实可靠的。

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新浦一地最初的位置应是在现孔望山东北处的玉带河闸一带,而不是在其它地方。

当然,从“新浦”这个小河名称,是当时人和一些形成较早的“老”浦相比而称呼的这一点看,别的地方也可能有叫“新浦”的小河流,甚至其入海口也叫“新浦口”。水利专家武同举所著的《江苏水利全书》中就说“(海州)城之西北也有新浦,亦有运盐河。”(《江苏水利全书》(二)卷二十三)。但这里所说的“新浦”和我们现在的新浦应该说是两码事。

三、新浦年龄辨

新浦这个地方的历史究竟有多长?这是对新浦初期基本情况认识不够一致的第三个问题。多数同志认为新浦的历史很短,至今不足200年。可有些同志持不同意见,却说连云港市海、古、神、幽,闻名遐迩,“与新浦相距不远的海州、花果山阿育王塔、赣榆徐福村、历史相当悠久。新浦年龄从何算起?值得研究。”这实际上也是涉及到当初“新浦口”一带是如何形成的问题。

研究任何一个地方的历史,都离不开对其周围环境变化的分析。新浦的出现、兴起与古海州海岸变化密切相关。在这个方面古海州志书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根据古海州志记载,早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的夏商时代,海州就属徐州。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这里就设置了胸县。因“胸山压海口”,州城临大海,至东魏武定七年(549年)改为海州。

海州得名于海,海州变化也在于海。刘洪石、张传藻两位同志10多年前曾写过一篇题为《从出土文物探讨连云港附近距今2500—6000年间海岸位置兼论明、清以来云台山成陆原因》的论文,指出古海州一带曾几经沧桑。在“五六千年以前锦屏山和大村的先民们是来往相通的。从锦屏山到中云台、南云台,并没有海洋的阻隔。”而后,由于宇宙变化多种因素,古海州一带海平面迅速上升。“到秦汉时代整个云台山完全被海水包围”,“锦屏山的前沿也受到上涨中的海水威胁。”“直至清初海州城东仍为海浸,云台山孤立海中。”后来因为黄河决口夺淮从苏北入海,引起了海州海岸的快速变化,以至又出现了清康熙四五十年间(1701—1711年),云台山和海州之间逐渐淤积成陆的现象。古海州志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多。如乾隆三十七年的《云台山志》说:“康熙十六年,漕运总督帅颜保奏仍复云台山为内地时,山在海中,……康熙四十年后海涨淤积,渡口渐塞,至五十年忽成陆地,直抵山下”;道光十六年谢元淮总修、许乔林纂辑的《云台新志》说,云台山“自古在大海中,康熙庚寅(即康熙四十九年)辛卯(康熙五十年)间海涨淤积,始通陆地”。再如1923年吴铁秋所著《苍梧片影》也说,“康熙四十年辛巳以后,可望不可及的神山,一旦成为平地。”

但所有这些都只是说,自清康熙四五十年间,云台山和海州海岸之间,开始有陆地相连,并没有说明先从哪一段连起,连接有多大片场。而事实上,现今新浦这一带,其时不但没有“一旦成为平地”,而且到距今200多年前,仍是古海州的近海区。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收录的康熙四十九年淮安知府姚陶写的《云台山记》就可证明。记曰,“庚寅夏,余以赈饥至海州,念海屿民困尤甚,携帑金自海州恬风渡渡海,甫登舟,暴风作,舟人不敢渡。余曰:‘饥民枵腹待赈,奈何不行?’遂扬帆。至中流,风益甚,蓬索尽断,大桅忽折,声震若雷,一舟皆惊,无复人色。山下观者飞舟来救。余笑曰:‘刺史固无恙也’。易小舟,到山下,入凤凰城,即南城也。”“恬风度”旧名黑风口。广二十里”(《江南通志》)。黑风口,也就是现在海州区锦屏镇范庄村的黑风口。据此记,我们可以看出,直到康熙四十九年(1710

年),海州东门外的黑风口,到南云台山西南角的南城之间,依然是惊涛骇浪的险恶海面。渡口又明明竖有“舟中人众休争渡,海上风高且暂停”的警示牌,而姚知府还冒险从此渡登凤凰山,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海州东北部与凤凰山之间,尚无旱路可走。

另外,从古海州内河变化情况来看,到康熙五十四年(1715年)因板浦口以下淤塞,海潮不通,向北新开了卞家浦。到了“嘉庆三年(1798年)淮北盐商以卞家浦海岸淤垫,捐挑戽河”(《江苏水利全书》)。盐商捐资清淤疏浚的河道就是“新浦”。至此,新浦及其入海处——新浦口,方才“问世”。这说明,直到嘉庆初,黑风口至孔望山东北一带,才逐渐脱离大海。而嘉庆九年唐仲冕在《甲子河记》中说,“此州十年来,潮渐北徙。故恬风渡最险恶,已成平陆,朐山以东,郁州以西,得沙田数千顷。”则更清楚地告诉我们,从1794年(乾隆五十九年)到1804年(嘉庆九年)期间,古恬风渡及其附近大片大片海域,才真正成为陆地。现在我们生活的新浦这一带,也才随之成为陆地。

新浦这一带,为什么到这时候才海退成陆呢?我们看一看新浦周边的地势就一目了然了。

东南部的灌云:地面标高,西部为3—3.5米,局部条岭地为5—20米;东部为2—2.5米,局部2米以下。

西部的东海:西部是丘陵地带,标高为30—100米;中部为平原坡地,标高为5—7米;东部一般为2—5米。

西北部的赣榆:其北部、西部地势高亢,标高为150—250米;东部、南部地势低洼,标高为10—3米之间。

东北部的云台区:和新浦接壤的云台山西侧,为河网密布的冲积平原标高为2—3米。

海州和新浦之间的地势,总的趋势是,海州高、新浦低。海州城内一般标高为5—6米,城内东南角最高,在20米上下。海州城向北、向东逐渐低洼,到现在幸福路大转盘、临洪滩一带标高为3.5米左右。过了西盐河,即现在新浦市区,更是越向东南越低洼。唯王巷一带较高,标高在3.5米左右。而现在的新浦东小区、南小区、新浦农场,直到海州的黑风口一带,标高只有2.5—3米左右。1970年新浦地区发洪水,到处一片汪洋,火车站向东都已划了船,而王巷附近却没有上水,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从以上可以看出,新浦地势最低洼。因此,在整个古海州海岸变迁过程中,新浦地区比周边地区“出世”都迟得多,直到“恬风古渡白沙平”,才随之沧海桑田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所以,要计算当今新浦的年龄,最多是从开挖新浦河,有了“新浦口”的嘉庆三年(1798年)算起,至今也不足200年。至于以后随着海岸变迁,新浦口逐渐移位到今天新浦民主路、前后河一带,那历久就更短了。因此,新浦这个地方,与早在梁天监十一年(512年)就建城的海州,与地处赣榆北部高地的徐福村,以及与建于北宋天圣元年(1023年)的花果山阿育王塔都无法相比。

四、新浦与独树浦辨

新浦与独树浦,是不是一回事,这是又一个需要辨别的问题。

“新浦”原叫“独树浦”的说法直到目前,在人们中仍然很有影响。说实在的,以前我也相信此说。1985年当时新海区和青海省哇玉香卡农场,在新浦盐河桥头合资兴建一座综合性商贸大楼时(即现在海云大厦),我就曾建议这座建筑叫“独树浦大厦”。

长期以来,人们为什么把新浦说成是独树浦呢?从一些传说和有关材料看,依据就是,新浦原是盐碱滩地,什么树也不长,唯独西跳头有一株百年老榆树。

其实,这是一种偶然的误会,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古海州志的有关记载,就可明了新浦和独树浦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首先,从形成的时间上看:

明代《隆庆海州志》有这样一些记载:“蔷薇河……东流至洪门坝及独树浦下海”;“独树浦桥……永乐五年建。”永乐五年,即公元1407年。可见桥下之“浦”形成更早。

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在记载“洪门堰坝”时写道:“元季王信攻张士诚,围海州,决此堰,移盐仓于独树浦,坝遂废。”据《明史》记载,张士诚是于元至正二十三年(1363年)九月重新自立为“吴王”,其兵力“北逾徐州”,屯兵于海州沐阳一带的元将王信,攻打张士诚部应是在这期间。

按此记载,独树浦至少在630多年前就已出现了,比我们现在的新浦市区要早400多年。

其次,从地理位置来看,新浦与独树浦也相距甚远。

《隆庆海州志》说:“独树浦桥在州北八里。《隆庆海州志》《海州总图》中,在城池北标有“渎树浦墩”(《释名》注:“渎,独也。”)根据这些记载,以及海州蔷薇河变迁走势等情况分析,当初的“独树浦”可能就在现在海州火车站北的范庄一带。很明显这和位于海州城东北的“新浦”及其孔望山东北处的入海口——新浦口,不是一个地方。

再次,从各自所属的水系看,“独树浦”是海州西部蔷薇河的下游,早在元代即为蔷薇河的入海通道;而“新浦”则是海州东南运盐河的下游,在清嘉庆初年为盐河的出海通道,直到后来随着大海迁徙,盐河和蔷薇河同时顺势延伸,“新浦口”移位到如今新浦市区这里时,新浦这个地方才形成这种既“为运河尾间”,又“据蔷薇河下游南岸”的特殊地理位置。

至于“独树浦”名称来源,是否因当初只有一棵树而得名,无从考证。而现在新浦西跳头确有一棵近百年的老榆树。在原先只长盐蒿、白花草,直到50年代初海潮还直达后河底的情况下,西跳头能孤伶伶地活下这么一棵榆树,实为一大奇迹。但是,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“新浦”原叫独树浦。

由于个人水平所限,对新浦初期的一些看法,肯定会有很多不妥之处,甚至造成新的误解,恳请各位专家、学者批评指正,以求我们对新浦初期历史,能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共识。

(作者系政协新浦区委员会副主席)



海州方志编修考略

张卫怀 曹寿田

海州地区虽偏处海隅,但修志传统悠久。从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二、《大明一统志》卷十三等典籍所引《州旧记》、《旧图经》、《海州图志》的资料看,古海州在唐代时就已开始编修志书。¹

由于时代久远,兵灾相加,诸多旧志今已见不到完整的版本。目前所知,从明嘉靖元年至清嘉庆十年的284年间,仅《隆庆海州志》、《康熙海州志》、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3部完整的方志传世。

一、隆庆海州志

该志于明嘉靖元年(1522年)由知州廖世昭和张瀛之子备倭守御东西二海指挥张柱倡修。²

廖世昭,福建怀安县人。由进士嘉靖元年(1522年)知海州,蔚有文名,纂修郡志,海山胜概皆有石刻。反改国子监博士。³此外,廖世昭还注重地方教育,申行社学,创建书院。社学“在城内四隅各二,城外、东海各乡四,西海各都及坊十四,共计社学二十六所、书院四、附郭二所。……本州旧无书院,嘉靖二年(1523年)知州廖世昭申行,提督学校萧御史鸣凤改观音院为崇正、长安寺为明道,以业童生课诵,委学官考学业。郭外曰石棚,在石棚山坡;曰伊芦,在伊芦山麓。”⁴

张柱乃瀛之子。张瀛,“字文渊,寿州人。袭祖鉴职为守御海州副千户,以胆略闻,盐盗屏息。……贼徒畏惧,称曰‘海张’。”后“升淮安卫指挥僉事,世袭。”⁵与知州廖世昭关系甚密,嘉靖二年四月,张瀛在石棚山“创泉石开草堂”,“筑石棚书院”,廖世昭为之立匾为纪。⁶张柱与廖世昭的关系亦当密切,“正德十六年,备倭东西二海指挥僉事张柱申请,宁巡按改私创以为公署,……国子博士、闽中廖世昭为记”;“嘉靖元年,备倭指挥张柱建立(守备公署)于州之乾隅,……知州廖世昭有记”。⁷

廖世昭升迁后,修志未果。40年后,海州同知张峰始继其业,编定8卷。张峰,“福建惠安县人。由庚戌(嘉靖二十九年,1550年)进士历任四川按察司僉事,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谪海州同知。署州事多方爱民,加意造士。后升绍兴府通判。”⁸“纂修州志,精严有法,时称史笔”⁹张峰编修了8卷海州志,主体工程应已告竣,因有政绩,升任绍兴通判,“张左官于海,书甫成以迁去。”¹⁰

淮安府知府陈文烛“守淮期月,欲修郡志,檄二州九邑各采其事,始知其无志。”¹¹海州知州郑复亨“谋诸进士张公,因得前二守惠安张公所辑公志存稿凡三帙。括輿图,统政教,式田赋,述徭役,藏经制,总挈条分,精详宏邃,且困事著论,扬榷古今。¹²于是得以仰希专刻之请,退而与州学博易君仕、沈君廷臣,县学博于君渠,暨州之博士弟子员十人,迹张公所辑之旧,益肆讨论,稍加增饰,爰请正于乡先达、光禄裴公为之讎其讹,厘其舛,几阅再月而集成,哀为十卷,乃授梓焉。”¹³明隆庆六年(壬申年,公元1572年)志书刻成后,陈文烛为之作序于“秋日”,¹⁴郑复亨作跋于“孟冬之吉”。¹⁵

陈文烛,隆庆四年(1572年)任淮安知府,六年海州志付印,为明万历元年(1573年)编纂20卷的《淮安府志》¹⁶提供了海州地区翔实的资料。

郑复亨,“浙江仁和县人,由举人隆庆五年任海州”知州,17在海州期间,他“爱民训士,修城池,兴学,增辑张峰《州志》而梓行之。”¹⁸实际是郑复亨从张朝瑞处得到张峰所辑前8卷初稿,经修饰加工,另增后2卷,并经裴天的校正,而终成10卷之制,10万余言。刊刻版本每版7竖行,每行宋体18字。

《隆庆海州志》的主修是知州郑复亨,主要编纂人为海州训导易仕、沈廷臣,赣榆县教谕于渠,州学生员张焕、孙璜等共13人。¹⁹

裴天祐“字顺之,赣榆人。……令建安,食御如寒士,为政务宽厚。巡按山东……晋大理……擢光禄,……既归,杜门谢客。著有《拙逸亭稿》,校张峰《海州志》。”²⁰

从廖世昭、张柱倡修,到郑复亨修成付梓,正好经历了半个世纪。

该志前有序,后有跋,设《海州总图》、《州治图》、《城隍庙图》、《文庙图》、《山川图》、《社稷图》共6幅,按照卷目体,分舆图、山川、户赋、治典、教典、名宦、人物、杂志、恩典、词翰凡10卷,除第10卷没分目外,前9卷共分79目,其内容记述范围,基本与明永乐十六年(1418年)明成祖朱棣“诏纂天下郡县志书”时所颁降的《纂修志书凡例》²¹所规定的一致。

因该志体例上“因事著论,切中要害,……颇具史裁。”²²在内容上“于风俗之间大书特书,而其所论述,皆生齿息耗、吏治淑慝,与夫幽贞之士、孤嫠之懿,篇翰之垂沉于山谷间巷者,一一可见,且贍而不秽,质而不俚”,²³成为“一方之宝鉴,而百代之信史”。由此,“探疲敝之原以还民衽席之上”,“一披览之暇而万姓疲敝之由得有所考而周知”,²⁴成为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珍藏的1000多种明代方志之一。1962年,上海古籍书店择优影印了107种明代方志,该志被列其中。1992年,由张卫怀、汤兆成利用业余时间试作标点,由北京燕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,市委副书记龚来宝为之作序。

二、康熙海州志

明代后期,战事频仍,社会动荡,或许州官无意修志,至少没见到有关记载。

天启元年(1621年)八月,刘梦松任海州知州,天启四年(1624年)自觉“其钱谷转输幸得无罪,至人文风景渐稍稍可观,是当详其记载,以志不忘。”因几十年没有续修州志,所以“山川之所葱郁,文物之所没发,沧桑之所更变,咸缺而弗载,”“乃集学博倪君效先,荐绅杜君一汶、赵君跃龙,庠友卞生有第、张生四可、苗生正春共聚奎楼,取前哲同知张公峰之所纂修,乡先达裴公天祐、张公朝瑞之所订正者,刻意校讎,痛加补辑。”志成后,刘梦松本人“于政事暇,复旁搜博访,删繁补缺,”使志书“华不蔓,简不陋,核不俚,废兴损益、美刺劝惩少寓旌别。”天启四年孟冬朔旦,刘梦松作《续修海州志序》。²⁵海州儒学署学正事、宿州人倪效先的《后跋》评该志“直欲表忠孝以励人心,敦简朴以还古道。浮名曩绩,置弗录也;实德潜修,幽必阐也,褒贬片言,彰瘡百世于都哉,一州明鉴,千年信史矣。”

26

刘梦松,“字寿江,山西沁州人。由举人历知海州。……时邹、滕莲妖倡变,震于其邻。梦松筑城增埤,固安人心,抢攘之余,辄事编纂,有儒吏风。”²⁷

该志刘序倪跋,皆作于天启甲子,是年倪效先始任海州儒学学正,故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认为重修于天启三年,实为不妥。

该志似应付梓印行,可惜不仅今已无法看到其原貌,而且在唐仲冕修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时可能已不传世,因唐志所引,未及该志。

该志修成整 20 年后,明亡。

顺治十三年,庞宗圣知海州。十五年(1658 年),因在祁县任知县时修过《祁县志》,遂欲续修州志,似未实施。庞宗圣,“字永华,山西闻水人。贡生。自祁县迁知海州,请免旧逋,招垦新田,续修州志未成,以赋额不足被议去官。”²⁸当时州志“版已毁之兵燹中”,仅郡学博赵无弦存二三策。

顺治十六年,刘兆龙知海州。刘兆龙,“字六御,江西安福人。曾祖佃官湖广布政使,入湘乡籍。由贡生任广西知县,迁知海州。……顺治庚子(顺治十七年,1660 年),与学博及诸生……重修州志。”³⁰刘兆龙重修时,“版籍已灰兵炬,……唯郡人学博赵君一琴仅存四卷、五卷,载历朝之来守兹土者。……惜乎散而不全,……乃谋诸司铎葵庵萧君、子韦金君,乡绅昌祚赵君、嗣良陈君、遇春苗君,共为因故葺新而缀续之。”该志“凡夫山川形胜、疆域规制、户口盈缩、赋役登耗,以及科名之振振、忠节之表表,哲人之芳踪,仙佛之幻迹,靡不犁然悉备。由是文献足征,典型具在。”不数月志成。

31

为续修州志,赵一琴在秋七月十三日布告《海州修志广征文献启》,“伏乞域中贤士,境内名公,或得之邺架郇厨,参以古籍,或宣之锦心绣口,锡以佳篇,收诸翡翠之床,浣以蔷薇之露。”从毕秀刊刻的《康熙海州志》中可见,当时应搜求到了《隆庆海州志》的版本。所以,根据“因故葺新而缀续之”的原则,制定了两条“凡例”:一是“存旧藉”,“其所论说纪序仍存”;二是“定新书”,“刘公兆龙至,竭力设法,以助梨枣,纂修之功,述倍于作,其中不无笔削,即标其名曰六御刘氏。”

该志“凡十卷,总目因郑复亨之旧,而赋役子目删盐课,人物子目删外传,其疏略多类此。然自天启以来,数十年之文献藉以不湮,其功亦未可泯也。”³²

顺治十七年志成,刘兆龙“捐俸付梓”并于“长至日为之序。”³³

顺治十八年海州裁海后,海州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地再续修过州志。

康熙丁未(康熙六年,1667 年)四月,山东新城人毕秀来任知州,庚戌(1670 年)秋曾作一《海州志序》,序中未及修志内容,而志文中已有其姓名、碑文,或许因刘志之旧而稍增益之。但目前所见,定非毕秀作序的《海州志》之原版,今见首都图书馆(原京师图书馆)藏本的《山川》中记“锦屏山”说:“旧名胸山,……明知州翁公讳选改名青龙山,……今州守孙公讳明忠因改为锦屏山”。³⁴孙明忠康熙十三年(1674 年)任海州知州,在官 7 年,康熙十九年(1680 年)迁嘉兴府同知。³⁵可以推断,北京馆藏本刊刻时间应在康熙十三年至十九年间,也有可能是康熙二十二年(1683 年)清廷编修《大一统志》时所上报的刻本。

该志体例上仍因州旧志,对《隆庆海州志》的内容有所删简,续述了隆庆六年(1572 年)以后百余年间的相关地方史料。

该志由张卫怀等 3 人标点,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于 1994 年 6 月出版发行。

此后,陈宣续修至康熙三十五年。陈宣,“海州人,岁贡生,有文行。康熙癸亥(1683 年)修《一统志》,各直省分修通志,征求山泽耆彦,宣与赵善理应聘往。书成乃归,后病瘳,杜门著书。念州志自顺治庚子(1660 年)至康熙丙子(1696 年)几四十年,搜集补缀,勒成一书。自言举三十七年沿革之大略,与夫忠孝节义,得于所见、所闻、所传。闻之最真者不敢略,亦不敢妄增;不敢隐,亦不敢溢美。今观其书,视他本较善。”³⁶唐仲冕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引其志最多,但在卷三十二《叙述录》的《旧志》之中没有载述,恐因非官修方志,不便印行,故今不见其版本。故唐仲冕《自序》中仅提及“康熙中,州人陈宣续志稿”。

三、嘉庆海州直隶州志

陈宜续修州志后 28 年的雍正二年(1724),海州上升为直隶州,辖赣榆、沐阳 2 县。又近 80 年后的嘉庆七年(1802 年),长沙人唐仲冕“自平江权知州事,因阅《刘志》零编错简,读不终篇。……然原本《张志》,续有论列,虽残缺失次,抑亦乾坤夏正。”适巧多年干旱成灾,“欲事纂辑,猝无余闲”。嘉庆八年,唐仲冕完成了建筑石室书院和开凿甲子河两项工程,在州人请求下,唐“乃遐搜旧闻,博采舆论”,³⁷开始了 40 余万字的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的编修工作。

在编纂过程中,参考了《隆庆海州志》、《淮安府志》、《陈宣州志稿》、《江南通志》、《东海志稿》、《续钞志》、《海邦文献拾遗》、《古朐考略》等重要的旧志和地方文献。³⁸

唐仲冕在自序中规定了该志载述的地域和内容的时间断限,“以今嘉庆十年为断,溯而上之,自国初始”。³⁹“书始作于嘉庆甲子(1804 年)五月,成于明年之冬十有一月。命之曰《嘉庆海州志》”。⁴⁰

该志在体例上一反隆庆以来“以事分门”的编排方法,而是按照历史学派的原则“按体分门”。全志先按图、表、考、传、录 5 体,再按事类分成 27 门,其中图六(舆地、山川、建置、学校、食货、海防),表五(沿革、纪事、职官、选举、旌奖),考七(舆地、山川、建置、食货、学校、祀典、海防),传三(良吏、人物、列女),录六(艺文、金石、寺观、冢墓、拾遗、叙述),门下视情设 77 个目,“一方之全史”备然志中。每一门类的内容范围在《自序》计中都有明确界定。全志计 40 多万字,共分 32 卷。

该志显然不是旧志的续修,故其序也不像其前志书那样续列旧志原序,而仅收万承风、许兆椿、孙源潮 3 个序。唐仲冕的《自序》仿《太史公书》收于录之第六《叙述》之中。

嘉庆戊辰(1808 年)小寒日,三吴督学使者万承风的序,主要在称颂唐仲冕的“善政善教”和修志的功德。同年秋,刑部右侍郎、江南江淮扬徐通海等处承宣布政使、唐仲冕的朋友云梦许兆椿的序除对唐仲冕大加赞赏外,还称赞该志“体大思精,去取确当”。嘉庆十六年(1811 年),曾于嘉庆七年知海州而复去,又于十三年再任的海州知州、宣城孙源潮“筮仕即与陶山缔交,兄事者十余载”,2 人“相知夙深,”情如手足,既受唐仲冕之请,又因“志刊七年,版有漫漶”,由孙“捐俸修补”,故又作序,⁴¹对其人其志,倍加推崇。同时可知该志初刊于 1805 年,修版再刻于 1811 年,今天所见,应是嘉庆十六年后的刻本。

该志之所以有较高的成就,除唐仲冕本人的才识和严谨的态度外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仲冕集中了当时阖州的一流人才,组成了一个较庞大的编修班子,其中不乏乾嘉学派的优秀人才,如凌廷堪、许桂林、许乔林等。所以志中极尽考据之能事,诗文附于志文,志文参以诗文。

近 180 年后,海州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当时由地方长官主持、由 33 人参加编修的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》这一宏伟巨著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在市委副书记龚来宝等人的倡议下,市历史学会仲其臻会长主持,邀请了我市一批一流的学者专家,在全市各地、各部门的支持下对该志予以整理,经过 10 年努力,终于 1993 年 7 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百万字的标点注释本,做了一件造福于连云港市 300 多万人民的一件大好事,钦慕崇敬之至!

(张卫怀系连云港市地方志基层指导室主任。曹寿田系连云港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)

1、姚石兰《海州古方志考》,(见《连云港志苑》1989 年第 31 页)。

2、《隆庆海州志·卷之七人物》燕山出版社,1992 年 12 月第 1 版,标点本第 127 页。

3、《隆庆海州志·卷之四治典》,燕山出版社,1992 年 12 月第 1 版,标点本第 70 页。